



從保守到百花齊放的 80 年代 「二號公寓」與北美館的藝術自主權之舞 The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No. 2 Apartment Gallery and Artistic Autonomy in an Era of Change

1994 年「二號公寓：名牌展」展出現場

文 | 王怡人 Wang Yi-Jen

風起雲湧的 80 年代

1983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開館，各方引領期盼，期待台灣的藝術會有一個全新的發展，同時與國際接軌，進而讓藝術家有發揮的舞台。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年代，正當政治上的戒嚴、解嚴分水嶺，社會從一個封閉保守轉向開放的起點，之前因為政治因素所禁閉的思想得到解放，劇場、文學、藝術都開始跨界的蠢蠢欲動。然而，剛剛解禁的社會，卻還不知該往哪裡去。當時新落成的北美館的調性、定位，與社會功能都還在模糊地帶，一個全新的美術館落成，原本應有新的方向與生命，但在長期戒嚴的社會下，資訊相對缺乏，經營者也在摸索如何經營一個新的美術館，在還沒有經

驗值可供參考的狀況下，依舊延續著戒嚴時期的博物館運作方式，與當時的歷史博物館、國父紀念館或者文化中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時一群甫從國外求學歸國的藝術家，滿心期待以自主實驗的創作觀念，企圖將國外所學發揮在這個舞台上，卻因此受到不小挫折，解嚴之後的社會已經開始渴望多元的思維與新穎的空氣，但長期以保守安全為考量的官僚習慣，對於充滿實驗性跟觀念挑戰的創作尚未認同，而當時的藝廊對於新的概念與想法也無法馬上接受。

在這樣的環境下，藝術家因為渴望擁有自己的舞台，開始思考著展覽空間的主體性，希望能有自主的空間來完整呈現自己的想法，不願受到檢核與宰制，於是產生了

「二號公寓」。二號公寓是一個「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是一群藝術工作者共同經營的空間，當中沒有人是老闆，或者權力大於另一個夥伴；也沒有組織的關係，它是一個接近合作社的概念，同時採取接納與開放的態度來對待參與成員。合作社每個成員每個月需分擔些許費用，也在年度中可得到一個檔期機會，可以發表自己的作品或是策劃一個展出；對於自己到底要展出的內容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在這個檔期可以展出他們不被美術館和藝廊接納的作品。

替代空間在當時的國外已經興起，但在台灣還沒有類似的空間出現。替代空間是一個除了美術館跟畫廊以外的展覽空間，許多尚未冒出頭的藝術家會在替代空間展出作品。因為開放性高，也因此許多在替代空間展出的作品往往是尚未發表且充滿藝術性與實驗性之作，充滿著活力與爆發力。當年許多藝術家也因為在替代空間闖出名號後，後來受到藝廊與美術館的注意。而在 80 年代除了二號公寓外，還有「伊通公園」、「no.1」等替代空間，它們在台灣的艺术從本土沙龍轉向當代藝術的發展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二號公寓——實驗性，多元性，平等性，自主藝術主權

二號公寓成立於 1989 年 8 月，是由多位當代藝術家組成，當中有留學美國、日本、英國、澳洲、西班牙、法國等留學生，可說集當時留學人才於一堂。當然他們也保持開放態度接受其他人，如中南部來的藝術家都會來參與聚會。最初場地是在蕭台興所提供的和平東路一段 85 巷 8 弄 2 號的公寓裡，因此就取名「二號公寓」。在這個空間裡，不但辦展覽，也有刊物及座談，藝術家在這裡談論關於藝術的想法，發表自己最新的作品，有志之士集於一室，儼然是一種藝術基地，當時的助理或者志工與熱心人士如今都已經成為獨當一面的藝術人才或者藝術官僚。

二號公寓的成員最早為 16 人，其中一度有 24 位成員，其中包括有范姜明道、連德誠、傅家瑋、侯宜人、黃麗絹、嚴明惠、侯俊明、黃志陽、黃圻文、林佩淳、黃步青、李錦繡、簡福鈿、曾清淦、陳龍斌、劉鎮洲、林振龍、鄭瓊銘、張正仁、吳梅嵩、楊世芝、黃位政等人，依其地點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和平東路時期的二號公寓、南京東路時期的二號公寓和龍江路時期的二號公寓，成員隨著空間的也略有更替。

從二號公寓的形成歷史已經確定了它的血統，那是一股自主藝術精神的渴望，意圖創作藝術性強、實驗性高的作品，提供了重視保守安全的美術館與商業濃厚的畫廊以外的另一種聲音。反抗馴化與老舊的思維，它所採取的態度正好與威權式的官方單位相反，多元性是使它茁壯的肥沃土壤，讓所有參與它的人得到其他夥伴相互激盪的思維養分與革命情感，同時能夠讓夠多的人參與，合作社式的經營模式提供的是一種平等與尊重，而當時屋主無償提供空間與民間人士的幫忙，幾乎可說是一種理想的左派烏托邦模式，如二號公寓在「一九九一公寓特展」的說法：「雖然二號公寓是一個總體，但它由 15 個『局部決定』的個體戶並置而成，它們明顯呈現一種無公約性 (incommensurability) ……並追求或達成任何一致的意見，說不定還應用不同的語言，各有各的遊戲規則……。」然而，這種理想多元的思維也是導致它爾後崩解的原因——隨著成員漸漸受到畫廊的注意，成員們對於經營方向也出現分歧，導致了二號公寓的崩解。成員的意見分裂成兩派，一派希望將二號公寓朝市場方向走，另一派卻對於商業化後失去藝術的自主性存有疑慮。雖然如此，結束的二號公寓，其成員都一致同意讓二號公寓成為一種精神的代表，不是團體的名稱，所有的人都不再使用「二號公寓」這個名稱，即使成員與經營地點有重疊也都將採用新的名稱再繼續經營。二號公寓的形成與它之後的歷史發展正是一個時代從封閉走向多元的一個縮影，它的生命本身就帶有浪漫的理想色彩



上：2013年6月1日，因本篇文章的訪談，在林佩淳老師的聯繫下，很難得的促成了二號公寓多位藝術家的聚會，地點是在土城山上林振龍的工作室。

中：二號公寓 1991 年北美館「前衛與實驗：『公寓—1991』」聯展，開幕現場，圖為時任館長黃光男先生。

下：1994 年「二號公寓：名牌展」展出現場



與藝術家在現實中求生的利益權衡，它的故事是藝術家積極為藝術自主與藝術生涯的奮鬥史，甚至可說它的本身就如同藝術與藝術家本身的命運。一如二號公寓成員之一連德誠在 1994 年 10 月《藝術家》所提：

二號公寓「死」了，墓碑上可寫著：「五年前，1989 年 8 月中旬，二號公寓在和平東路的小巷子內的公寓房子中舉行開幕聯展。五年後，1994 年 8 月下旬，二號公寓的二十多位成員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盛大演出『最後一夜』，那是二號公寓『停止空間』的告別展：整整五年。」

——五年，算是夭折。

在野與官方的探戈



二號公寓與當時的其他替代空間，藉由展覽空間的自主權而掌握了藝術的自主性，不斷的提出許多實驗性的想法與概念。適逢北美館作為台灣第一座現代美術館——北美館成立不久，這座被賦予高度期待的官方空間，遂與當時許多藝術團體產生許多連結，裡面有合作互動也有摩擦。以二號公寓在 1991 年於北美館地下樓的「前衛與實驗：『公寓-1991』」展出為例，因為不明原因的起火，導致展出藝術家的作品損壞燒毀，但是當時美術館申請展的藝術保險制度尚未建立，此事

件造成了藝術家與館方不小的爭執，但其結果卻奠定了日後美術館在館內所有展出的一致性保險機制。從結果來看，此事件正是替代空間與美術館關係最好的註解，替代空間與官方相互的刺激形成一種正向的循環，使制度益發完善也拓展了官方對於前衛性作品的接受尺度。而替代空間之間的競合關係更加速了藝術圈的活絡，替代空間本身的生猛活性打破了當時保守拘束的藝術氛圍，同時媒體也開始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媒體對於替代空間實驗性創作的重視，使二號公寓的知名度與聲名逐漸傳播開來，影響所及，北美館開始漸漸接受這些原本被它拒於門外的藝術家。連德誠曾在 1993 年《炎黃雜誌》中「替代空間，替代甚麼？」一文指出，「如果畫會式微，替代空間替代了畫會成為 90 年代台灣美術發展的重鎮，這種藝術團體的轉變背後的重要訊息是：台灣的現代藝術工作者愈來愈多，而藝術表現也愈來愈多元。替代空間的出現不只在某種程度上集結了藝術家並滿足了他們空間的需要，並且推動及映現了當代藝術波瀾壯闊的前景。替代空間的出現，標示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具有實驗色彩的替代空間，逐漸變成了美術館與畫廊專／職業對藝術家的儲訓班，美術館某些大小展覽的預演舞台。替代空間既然不是終點，那麼它是藝術家邁向美術館及畫廊的中途站、一種跳板。而二號公寓及其他替代空間和北美館形成了互相競合關係使之走往完全不同於創始之時的運作模式。

台北市立美術館做為一個現代美術館，是公眾審美及品味的教育基地，展覽的策略方針與其隱身背後的意識形

態、權力操作、知識的建構，都對於大眾有傳播性的影響。而在其中的運用機制、資源分配最後所形塑出來的展覽，對於藝術環境都有極大的影響力。藝術的發展與社會乃是密不可分，北美館作為機構的代表更有指標性的意義，從 1983 年成立至今，它的歷史軌跡也正對照著台灣社會從解嚴轉向開放的潮流現象。

台北市立美術館與藝術圈如今面對的是全球化，各類策展論述等議題，在 2013 年回顧起 1983 年的那個起點，今日台北市立美術館已經成為了台灣藝術家的角力舞台，也是將台灣藝術人才帶往國際的重要推手，現有的藝術環境比起當時已有天壤之別。如同另一位二號公寓的成員陳建北所言：「替代空間，已在十年前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現今的替代空間，多了許多經營彈性跟折衷的方式，除了國家文藝補助外，也有複合經營，或接國家發包案子的生存模式。看似多元與熱鬧滾滾的外表下，我們真的與國際的藝術舞台有所接軌，或者全然的擁有了藝術的自主性了嗎？二號公寓雖已停止運作，然而它所提出的藝術自主性，展覽空間對於藝術家的想法尊重與支持，台灣藝術家在國家的藝術殿堂獲得發展的空間，進而能夠得到國際矚目這些訴求，在經過了 30 年的今日，依舊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本文作者為自由撰稿人